

●语言研究

汉语偏正式构词的强化机制

蔺 伟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隐喻和转喻对汉语偏正式构词具有较大的强化作用,但二者强化方式不同:隐喻构词以跨域参照为认知基础,主要通过主体自洽来实现概念整合;转喻构词以完形凸显为认知基础,主要通过框架压制来实现概念整合。这两种机制可以有效消解偏正式构词的语义障碍,使其构词能力得到更大发挥。

关键词: 偏正式复合词;隐喻;转喻;认知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730(2018)04-0033-05

收稿日期: 2018-01-18

DOI: 10.13757/j.cnki.cn34-1329/c.2018.04.007

作者简介: 蔺伟,男,江西宜春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偏正式构词法作为当代最能产的构词方式,具有深厚的认知基础。偏正式复合词“特征词素+中心词素”的表层结构,是以“特征+义类”的语义结构为支撑,反映了人们对客体的一般概念化方式。绝大多数偏正式复合词源于我们对基本层次范畴的进一步细分即次范畴化,而在两个概念之间建立直接的特征修饰关系,是实现次范畴化最便捷的方式。但当这种方式难以满足更高的认知需求时,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强化来消解概念冲突或语义障碍,以建立间接的特征修饰关系。沈怀兴对偏正式构词法进行过系统论述,他指出偏正式构词法的强能产性是客观世界发展和人的思维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指出它在内化外部渗透的能力上比其他构词法更具优势^[1]。这启发我们不仅要看到汉语偏正式构词的深层动因,也要看到偏正式构词法在语义内化能力上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偏正式构词的重要强化机制,借助隐喻和转喻,可以较好地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概念之间建立特征修饰关系,因而能大大增强偏正式构词法的构词能力。

一、强化构词的类型

为方便讨论隐喻和转喻对偏正式构词的强化作用,我们需多角度归纳隐喻和转喻的构词类型。

(一) 隐喻构词的类型

对于隐喻构词的类型,我们按照喻体的词内分布及本体和喻体的范畴匹配来进行归纳。

1. 喻体的词内分布类型

(1)前喻式隐喻构词。前喻式隐喻构词,是指这种隐喻在构词的时候用喻体词素充当修饰成分,用本体词素充当中心成分,喻体词素以隐喻的方式表示义类的特征。例如“剑麻”一词中,“剑”以隐喻的方式表示“麻”的特征。类似的还有柳眉、狼狗、杏眼、梭鱼、冰糖等。

(2)后喻式隐喻构词。后喻式隐喻构词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构词的时候,本体词素充当修饰成分,喻体词素充当中心成分,喻体词素以隐喻的方式表示整个词的义类,如“病魔”一词中,“魔”以隐喻的方式表示整个词的义类,暗示破坏性、毁灭性等特点。类似的还有林海、火海、茶砖、煤砖、浪花、雪花等。另一种是在构词的时候,本体不以词素的形式出现,而是寄生于喻体词素。如“骨盆”一词中,本体并没有形式显现,而是寄生于喻体词素“盆”。类似的还有木马、纸花、牙床、舌苔、耳轮、心房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后喻式构词隐喻表述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N2以隐喻的方式描述N1,为隐述型;后者是N2以隐喻的方式指称另一种未知事物,为隐指型^[2]。

(3)前后同喻式隐喻构词。前后同喻式隐喻构词,是指两个词素以隐喻的方式分别充当特征词素和中心词素,这时两个隐喻的本体均不出现,只能通过词义推知。例如在“袋鼠”这个词中,“袋”和“鼠”便都使用了隐喻。类似的还有鳌山、刺针、银河、银耳、浪船、环岛、门将、墨鱼等。

2. 本体和喻体的范畴匹配类型

隐喻构词的范畴匹配,主要是在人和动植物等有生范畴及自然物和人工物等无生范畴中进行。

(1)本体为动植物。本体为动物时,喻体也为动物的有狼狗、马鹿、狗熊、豚鼠、羊驼、蝙蝠、蜂鸟等;喻体为人工物的有柴鸡、板鸭等;喻体为自然物的有驼峰等。当本体为植物的时候,喻体为动植物的有鸡冠花、狗尾草、鹅掌枫、狗牙花、蝴蝶兰、羊角菜、马尾松等,数量较多;喻体为人工物的有瓢儿菜、喇叭花、锯齿草、金针菇及树冠、秧针等。

(2)本体为人或人的组成部分。本体为人或人的组成部分时,喻体为动物的有狗官、牛人、虎父等;喻体为植物的有植物人、樱桃嘴、芝麻官等;喻体为人工物的有水桶腰、木头人、铁人及牙床、耳轮等;喻体为自然物的有霜鬓、眉峰、眼波、舌苔等。

(3)本体为人工物。本体为人工物时,喻体为动物的有马蹄表、鸡心领、蝙蝠衫、燕尾服、鸭舌帽、斑马线等;喻体为植物的有棉花糖、香蕉球、禾旗等;喻体为人工物的词数量最多,且多表示具体事物,如胆瓶、梯田、房车、旗枪、斗箕、松糕鞋、钉子户以及笔帽、灯伞等,少量表抽象事物,如法网、情网等;还有喻体为自然物的,如碑林、刀山、爱河等。

(4)本体为自然物。本体为自然物时,喻体为人或人的组成部分的,有山头、山脉、风口、风眼等;喻体为自然物的有林海、浪峰、洪峰、波峰等,喻体为人工物的有海带、河床、雨帘、石钟等;喻体为动植物的有石笋等。

(二)转喻构词的类型

对于转喻构词的类型,我们可以从喻体的词内分布和转喻所依托的认知框架来进行归纳。

1. 喻体的词内分布类型

(1)前喻式转喻构词。前喻式转喻构词,是指在转喻构词的过程中,喻体词素充当修饰成分,以转喻的方式表示中心成分的特征。这种转喻构词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中心词素以本义的形式接受喻体词素的修饰,如“门客”是由“门”在转喻“家”的基础上与中心词素“客”构成。类似的还有笔资、脚钱、手民、牙佞、色欲、眼福等。二是中心词素以隐喻形式接受喻体词素的修饰,如“肉票”是由“肉”和“票”分别在转喻和隐喻的基础上构成的。类似的还有脑库、脉枕、口碑等。

(2)后喻式转喻构词。后喻式转喻构词,是指在转喻构词的过程中,喻体词素充当中心成分,以

转喻的方式表示整个词的义类。后喻式转喻构词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一个词素以本义充当喻体词素的修饰成分,例如“国脚”是由“脚”在转喻足球运动员的基础上与表领属的“国”构成。类似的还有口红、葱白、家丑、裙摆、中卫、耳垂、货轮、袖管、笔筒、麦片等,数量较多。二是一个词素以隐喻形式充当喻体词素的修饰成分,如“花卷”是由“花”和“卷”分别在隐喻和转喻的基础上构成的。类似的还有肥缺、蜗居、脚注、眉批、花押等。

(3)前后同喻式转喻构词。前后同时转喻构词,是指在转喻构词过程中,两个名词素均发生转喻,然后在此基础上构成特征修饰关系。例如“祸心”,是由“祸”和“心”分别在结果转喻行为和思维器官转喻思维内容的基础上构成的。类似的还有策论、球迷、马弁等,数量较少。

2. 认知框架类型

转喻构词建立在对认知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日常认知体验,转喻构词主要基于以下几种认知框架:

(1)整体一部分。基于整体一部分框架的转喻构词,多是部分转指整体,这其中既包括具体的整体一部分之间的转喻,也包括抽象的整体一部分转喻。具体的整体一部分之间的转喻,有口粮、门客及国脚、活口等;抽象的整体一部分转喻一般是活动与活动要素之间的转喻,如笔会、脚夫、手民、槽坊等。

(2)动作—施事/对象/工具。基于动作—施事框架的转喻构词,多是动作转指施事,如向导、球迷、敌探、门卫、外教等;基于动作—对象框架的转喻构词,多是动作转指动作对象,其中以动作转指动作受事的如库藏、热饮、家训、奇谈、美谈、史抄等,动作转指动作结果的如麦垛、石刻、食积、肉冻、蝉蜕等;基于动作—工具框架的转喻构词,多是动作转指工具,这类词数量较多,多表示用品,如槽刨、字据、酒提、耳塞、牙刷、枕套、沙漏、茶托等。

(3)事物—性状/形态。基于事物—性状框架的转喻构词,多是某种性状特征转指具有该性状的事物。如“菜干”的“干”转指一种脱水物,王洪君指出其内部语义关系为“质料+特性物”,是正常语序的偏正式复合词^[1],类似的还有豆干、眼白、蛋黄、铜绿等;基于事物—形态框架的转喻构词,多是某种形态特征转指具有该形态特征的事物,如“雪片”中的“片”转指片状的事物。这类词与“菜

干”类复合词一样,中心词素都是在转喻的作用下发生了语法属性和语义内涵的变化,类似的还有瓜片、金条、煤块、雨点等。

二、强化构词的认知基础

隐喻和转喻对偏正式构词的强化作用有着不同的认知基础,其中,隐喻构词是基于跨域参照,转喻构词则是基于完形凸显。

(一)跨域参照与隐喻构词

Langacker 立足于语法的认知性提出“参照点”(reference-point)理论,认为人类在对一个概念进行理解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或依赖于另一个概念^[4]。刘宁生也借用“参照物”和“目的物”来理解汉语中的偏正结构并将其作为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5]。比如在生活中,当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地点的空间方位的时候,常常需要借助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其他事物来获得对目标地点的认知,如在“图书馆在1号教学楼的东边”这一表达中,我们是通过1号教学楼来获得图书馆的具体位置的,图书馆是认知目标,而1号教学楼是认知参照,这种参照认知起到了有效的限定作用和明确的指称作用。

我们认为,隐喻本质上就是一种跨域的参照认知活动,隐喻构词是我们通过跨域参照来获得新的概念形式的认知过程。人们往往以一个相对简单的、熟悉的、形象可感的概念获得对一个相对复杂的、不熟悉的、可感性差的概念的认识。例如“罐车”的构词,是人们参照“罐”来获得对车的外形特征的认识过程,作为我们生活中较常见的日用品,罐子因其简单易感的形态特征和极高的使用频率能有效作为人们对某一类车子的认知参照,从而实现经济合理的命名与独特的表意效果;又如“鱼苗”的构词,是人们参照“苗”,达到对“鱼”的生长阶段特征的认识过程,作为初生的植物,苗因其突出的形态特征及其所寄寓的生长期望能有效作为人们对处在初级生长阶段的鱼的认知参照,化抽象为具体,形象生动。在参照认知的规律之下,我们很少直接以人作为喻体来隐喻其他范畴的事物,也很少用静态形式的事物来隐喻动态的事物,因而这一类隐喻构词数量也是极少的。

(二)完形凸显与转喻构词

认知框架是根据经验所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是人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处于同一认知框架中的概念具有认知上的

邻近关系^[6]。转喻对构词的强化自然是离不开认知框架的支撑的。例如“牙婆”指的是旧时汉族民间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而从中牟利的妇女,这个词的构成依托于“活动——活动要素”这一框架。牙是人们说话行为的参与要素,甚至可以说它和舌头一样也是人说话的重要凭借,因此牙常常可以转喻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我们经常说的“伶牙俐齿”、“铁齿铜牙”等。对于旧时从事人口买卖的妇女来说,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表达技巧是她们的必要本领,说教是她们的主要活动内容,“牙”和“说教”是处于“活动——活动要素”框架中,这两个概念具有认知上的邻近性,“牙”作为复杂的、抽象的活动要素可以激活我们对“说教”这一简单的、具体的言辞活动的认识。因此我们以“牙”转喻说教行为,用“牙”修饰“婆”,形象地表现了这类女性的职业特点。

那么,转喻所依托的认知框架是如何构建的呢?这其实是我们完形感知的结果。我们在谈论一个动作行为时,往往会将该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承受者和动作行为的工具、影响等因素作为背景信息一同使用,形成施事——动作——受事/工具/结果这样一个基本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心理上的“完形结构”,它在认知上相比其部分反而简单,因此常以整体形式被人们存储和记忆,在这个“完形结构”中,不论是事件整体与要素之间,还是各事件要素之间,都存在相互激活的较大可能。认知框架的构建为转喻提供了一个作用域,但在具体框架中又该如何确定源域或者喻体呢?这其实是和我们对框架要素的认知凸显有关。在一个认知框架中,具体要素的凸显是由该要素的显著度来决定的,就是说,同处一个认知框架中的要素A和B,A转喻B的条件,是A在认知上必须比B更显著。我们在用壶烧水的时候有时不说“水开了”而说“壶开了”,就是因为在壶烧水时,壶比水更容易被我们感知。拿“搬运”这一事件框架来说,它一般包含搬运的主体、搬运的对象、搬运的主要工具等要素,但对于从事搬运活动的人而言,脚是他们在搬运活动中的重要凭靠,因为没有足够的脚力,是很难从事搬运这一职业的,所以“脚”可以转喻整个搬运活动。“脚”以转喻的方式充当“夫”的修饰成分构成“脚夫”一词,正是基于“脚”在“搬运”这一事件中的凸显。需要说明的是,决定一个框架要素能否被凸显的所谓显著度,仍然是由我们的认知习惯决定的,在搬运活动的认知框架中

包含诸多框架要素,但除非旧时的绝大多数搬运工在非常特殊的时间、地点或者穿极为突出的服装来从事搬运工作,否则时间、地点、服装等要素在整个“搬运”事件中是不容易被凸显的。

三、强化构词的运作机制

隐喻与转喻对偏正式构词的有效强化,得益于它们的概念整合能力,这种整合是在语义错配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语义错配情况下,隐喻的概念整合主要依靠主体自洽来实现,转喻则主要依靠框架压制来实现。

(一)语义错配

语义错配是指两个构词成分在语义关系上难以正常匹配,这种错配主要体现为范畴错配和修饰关系错配。在隐喻构词方面,范畴错配是指以隐喻方式构造的偏正式复合词的两个成分所表示的概念各属于不同认知范畴,如在“扇贝”中,贝属于有生范畴,扇属于无生范畴,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是一种范畴上的错配;修饰关系错配则是指以隐喻方式构造的偏正式复合词的两个成分所表示的概念不能形成常规的特征修饰关系,如“木”作修饰成分的时候往往表示中心成分的材料属性,但马作为一种动物,并不具有材料属性,不能被表示材料属性的“木”修饰,因此“木马”中词素“木”和“马”所表示的两个概念是一种修饰关系上的错配。

在转喻构词方面,范畴错配是指以转喻方式构造的偏正式复合词的两个成分在概念上各属于不同语法范畴,例如“蟹X”类词中的蟹壳、蟹脚、蟹钳等词,其中心词素“壳”、“脚”、“钳”等都是常规的名词性词素,然而“蟹黄”的“黄”却是一个形容词性的词素,这便是一种范畴上的错配;修饰关系错配是指以转喻方式构造的偏正式复合词的两个成分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常规的特征修饰关系,如我们在指称某种集会时,一般以主题内容作为特征修饰成分,而“笔会”中词素“笔”和“会”之间显然不是这种常规的特征修饰关系,这就是一种修饰关系错配。

(二)主体自洽与隐喻构词

“主体自洽”是王文斌在逻辑学中的自洽(self-consistency)性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隐喻使用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主张在使用隐喻时,施喻者需顾及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容性,并对此

进行自我协商,从而达到自我核定、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7]。我们认为,隐喻的概念整合同样要依靠“主体自洽”来实现。我们所构建的隐喻,其本体和喻体须具有某一方面的相容性和一致性,须协调一致而不能自相矛盾。例如我们借助隐喻构造出“人海”一词,是基于对具有一定数量规模的、壮观的流动人群的感受和认识,人群与大海在我们的认知中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然而,当我们在认识成片的房屋时,是否也会以“海”作为认知参照并构造出“房海”一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即使我们因为房屋的集聚场景而联想到了海的广阔,却最终会因为海的流动性特征和房屋的静态特征不相符而放弃这个隐喻,自然就不会随意构造出“房海”一词。这就是主体自洽在起作用。

“主体自洽”具体包括连接(linking)、冲洗(washing)和合流(converging)这三个步骤,它是一个动态的思维加工过程。连接,是施喻者通过联想而将两个不同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这是隐喻运作的第一步。神经认知科学研究指出,人类大脑可以在大于三万分之一秒、少于三秒的时间内,将各自独立的意象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说明隐喻的这种连接能力是具有一定的神经认知基础的。当然,当人们要为目标域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始源域时,除了这种天生的连接能力,还需要随时调动储备在大脑中的社会经验和百科知识。冲洗,是主体自洽的中间环节,是指施喻者在概念连接的基础上,对来自不同心理空间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取舍,保留两个概念在认知上关联度最大、匹配度最高的信息,淘汰无关紧要的信息,以确保构建出一个形式上最合理、表达效果最理想的隐喻。合流,是最后环节,也是概念整合的关键环节,是指施喻者认定两个概念具有可以在认知上进行特征匹配即这个隐喻可以成立、可以被受喻者的知识、经验所识解时,最终将这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新的概念。例如,在对某种具有基本居家设施的车进行认知时,因直接的特征表述方式不足以传达这种车的特点,人们便借助隐喻,首先根据这种车的特点(如外观、性能、用途等)联想到其他概念,然后根据特征匹配程度来筛选出最佳参照对象,最终,人们根据这种车的功能特点,以房子为最佳喻体,将“房”和“车”这两个本没有直接特征修饰关系的概念成功整合,构造出“房车”一词。

(三)框架压制与转喻构词

与隐喻不同,转喻的概念整合主要依靠的是“框架压制”。袁毓林在解释学界存在争议的后喻式隐喻复合词时提出“句法强制性”理论,认为偏正结构为保持“前偏后正”这一优势语序会迫使中心词素意义发生变化,从而使语义和句法保持一致^[8]。我们认为这是偏正结构的框架压制作用。

偏正结构作为一个规则性较强的构词框架,对于构造出的复合词通常有以下限制:语序上,前偏后正;内部语义关系上,特征词素表示对中心词素的特征修饰关系;成分和整体关系上,当复合词整体表示名物时,中心词素具有名性义;对于进入偏正结构的构词成分,必须满足这一框架的结构与语义要求,一旦出现不符合这一框架特征的成分,人们便会按照固定的框架模式对进入的成分进行形式和意义方面的调整^[9]。例如鸡公、沙雕、雪片等偏正式复合词,由于其中心词素“公”、“雕”、“片”等在语言中是典型的形素、动素和量素,于是出现范畴错配的情况。但修饰成分在前、中心成分在后是汉语偏正结构的常规模式,且中心词素的意义类别必须和整体意义类别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结构框架会强制中心词素所表示的概念向着邻近概念发生移变,于是最后“公”便转喻“动物当中的雄性”,“雕”转喻“雕刻出来的事物”、“片”转喻“片状的某类事物”。当然,能够服从框架压制的框架成分,本身是具有被压制的语义基础的。进入偏正结构中心位置的非常规词素,主要是动素和形素,而它们之所以能在框架压制下获得名物义,跟它们自身的语义特征也有关系,例如,“牙刷”中的“刷”、“石刻”中的“刻”等动素分别是在框架压制下转指动作行为的

工具和结果;而“蛋黄”中的“黄”、“肉圆”中的“圆”等形素都是在框架压制下转指具有该性状的某种事物,况且“黄”、“圆”等词素都具有较明显的空间义,这一点跟名词是很接近的,事实上,能够偏离而又最终合轨正是压制本质的彰显^[10]。

综上,汉语偏正式构词除了受范畴化的促动,也得益于隐喻和转喻的强化作用。隐喻以跨域参照为认知基础,通过主体自洽来实现概念整合;转喻以完形凸显为认知基础,通过框架压制来实现概念整合。这种概念整合能力是偏正式构词突破语义障碍的重要条件,大大增强了这种构词法的能产性。

[参考文献]

- [1]沈怀兴.汉语偏正式构词探微[J].中国语文,1998(3):189-194.
- [2]黄洁.基于参照点理论的汉语隐喻和转喻名名复合词认知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 [3]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J].汉语学习,1999(2):9-11.
- [4]LANGACKER R.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J]. Cognitive Linguistics,1993 (4):1-38.
- [5]刘宁生.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J].中国语文,1995(2):81-89.
- [6]沈家煊.转指和转喻[J].当代语言学,1999(1):3-15.
- [7]王文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01-106.
- [8]袁毓林.论句法的强制性——从一类N1N2名词的句法语义分析展开[J].汉语学习,1988(1):6-11.
- [9]宋作艳.定中复合名词中的构式强迫[J].世界汉语教学,2014(4):508-518.
- [10]施春宏.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J].当代修辞学,2012(1):1-17.

责任编辑:张丽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the Modifier-head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

LIN 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Ningbo University,Ningbo ,Zhejiang)

Abstract: Metaphor and metonymy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propell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ifier-head words,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mechanisms: metaphor, which is based cognitively on cross-domain reference, obtain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relying mainly on self-negotiation, and metonymy, which is based cognitively on the activities of highlighting in a gestalt, obtain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relying mainly on coercion of frame. These two mechanisms can decrease effectively the semantic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ifier-head word formation, thus better exerting its abilities in producing this kind of compound words.

Key words: modifier-head words; metaphor; metonymy; cognition